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王 郝 维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要:《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 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 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学术史;清学史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2-0051-08

《清代学术概论》是一本颇具“魔力”的小书,“魔力”说出自梁启超自评其文“条理分析,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1]⁸⁶。自成书以来,深受读者的欢迎,接连再版,成为该领域的入门书;在学界,该书虽饱受争议,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领域的“典范”之作^①。《清代学术概论》同它相关联的文本共同组成了梁启超有关的清代学术研究系列,其中包括了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近代之学术》一部分,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相关著述。由于《清代学术概论》在诸文本中独具的“过渡性”^②,所以学者多选择以它为中心对梁启超关于清学的论述加以考察。自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相关研究数量可观,故按时序大致列举,对其中较具代表性研究加以概述,可以梳理出《清代学术概论》百年来接受史的大致面貌^③。

一、不同时代对《清代学术概论》的不同评价

《清代学术概论》前后有四个版本:原稿、原稿补正本、《改造》本、通行本。就原稿已有林志钧和蒋方震对原稿提出了批评意见^[2],胡适亦以两封长函的方式提出了批评意见^[3],梁启超在采纳其部分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原稿补正本。当时原稿又曾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之蜕变》为名,在《改造》3 卷 3 期到 5 期连载,这 3 期按其杂志上自记,分别于 1920 年 11 月 5 日、12 月 5 日和 1921 年 1 月 5 日发行,但是其内容并非原稿本照录,大部分内容与原稿本相同,少部分内容与《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后来提到原稿无惠栋、戴氏后学和章炳麟三章,但《前清一代中国思想之蜕变》一文中无惠栋和戴

收稿日期:2022-11-08

作者简介:王郝维(1992—),男,云南昆明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既存研究对《清代学术概论》典范性说法论述颇多,但涵义都稍有不同,论述最详细的有丘为君的《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清华学报》新 24 卷第 4 期)。

②对于《清代学术概论》在梁启超清学史相关文本中所处位置,既存研究论述颇多,但大多倾向于注意《清代学术概论》在其中承上启下的关联性,例如徐雁平就认为《清代学术概论》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间的过渡物,见氏著《〈清代学术概论〉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8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关于《清代学术概论》的研究史的论文有戴磊的《近三十年来〈清代学术概论〉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13 年第 11 期)。该文以三十年为限,笔者则试图勾勒出百年来《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且补充了该文未涉及的海外及跨学科等研究。

氏后学两章,却有章炳麟一章。而前两章在单行本中插入位置正是《改造》3卷3期、4期连载部分,后一章插入的位置是《改造》3卷5期连载部分。结合梁启超12月18日写给胡适信中提到单行本已付印,可以推测梁启超没有来得及大幅修改《改造》3卷3期、4期内容,到5期才加入大量修改内容,故《前清一代中国思想之蜕变》一文应是原稿和单行本之间的过渡物。其中胡适的批评已不见原信,但他在日记中提及了部分修改意见^[4]²⁴⁰,可视作现存最早见诸文字的对《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批评。此后见诸公开学术刊物的书评或学术批评并不多见,但见诸私下言说的批评却不少,如钱基博和吴稚晖分别对《清代学术概论》提出了不少看法^①。《清代学术概论》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则可见于当时出版界和教育界中的一些材料,如1932年中华书局已赶在《清代学术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前抢先出了其第八版,其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1]¹²。在钱穆于1926—1928年撰写的《国学概论》中,就声明章太炎《国学概论》不适合作学校讲义,而采用《清代学术概论》的体例大意,可知其受学术界的欢迎程度。

对《清代学术概论》正式且公开的学术批评,多见于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时人对他及其著述进行追忆和评价的文章中,代表有郑振铎的《梁任公》^[5]、素痴(张荫麟)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6]。两文虽各有自己的观点,但都共同推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当时学术界的开创性意义,对《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价则较一般。郑振铎比较看重《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于康梁二人和今文学运动的评述。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和张荫麟算是纪念梁启超群体中较为新派的人物,又可视作梁启超的后辈,故其只能代表当年纪念情况中的一个侧面。但以二人为代表的这部分群体却是最重视梁启超学术史成果的。或因二人新派色彩,其文章对梁启超的一生都好以分期论述,而对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期最为看重,推重其“重估一切价值”的特点,故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极为推崇,对《清代学术概论》则视作其晚年对近三百年学术史整理工作的一部分,评价不多且评价一般,与今日研究者对梁启超学术史的评价体系颇为不同。另一方面,二人观点主要代表的还是当时属于新派人物的声音。当时纪念梁启超的群体所著文章极为庞大复杂,目前既存研究

对这些文章已有不少相关探讨,且似有进一步展开空间。尤其是其中不少文章对梁启超的评价极为独到,甚至不自觉地对后世梁启超研究提供了启发,这些文章在辨别其目的性与材料真实性的前提下值得进一步利用^②。

自梁启超去世到1949年以前,有关《清代学术概论》及梁启超清学研究正式而专门的研究材料尚不多见,但在清学史研究领域对其的批判继承则没有停止,钱穆和周予同的清学史研究是其中的代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成为了该领域的基本参考书,其与梁启超同名著作的比较研究更成为后来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钱穆对梁启超清学史研究的继承、批判与发展早在其著《国学概论》时就已开始,其中钱穆在后来《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中不少观点的萌芽已出现在该书中,且点明是与梁启超立异,而该书在体例大意等方面对《清代学术概论》的借鉴似乎不太为人注意^③。除钱穆外,周予同关于清学的论述继承了梁启超不少观点,如对清学史的分期等,发展而形成了对清学史以及学术史一整套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④。同一时期编纂但出版较晚的《梁任公年谱长编》^[7]以书信为主要内容,成为后世研究梁启超的重要著作,又为梁启超学术史的创作背景保存了大量材料。但稍有遗憾的是,就《清代学术概论》成书前后而言,该书对当时梁启超和胡适二人交往方面的材料收集稍有不足,如书中关于胡适和梁启超的初晤时间就颇有争议,朱洪斌对《梁任公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都认为梁胡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而此后研究者多放弃两种年谱的说法,认为梁胡初晤是在1920年3月21日。由于两种说法

^①钱基博在《后东塾读书杂志》中对《清代学术概论》提出不少意见。(见《青鹤杂志》1卷5期,第1-2页)。吴稚晖在评论梁启超近年来作为时也提到《清代学术概论》,见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黄山书社2008年版)。

^②相关研究参见夏晓虹《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相关纪念文章参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③关于此点,罗志田已注意到其不同,并提出由此可知钱穆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见氏著《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④参见周予同《“汉学”与“宋学”》,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出版社1983年版)。周予同治学受到梁启超的影响,除了他在《“汉学”与“宋学”》中表示接受《清代学术概论》对清学史的分期外,朱维铮也曾指出周强调真假孔子的区别,吸取了梁启超的意见。见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出自《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46页。

的不同涉及到五四运动与梁胡初晤背景的关系,故此分歧值得注意^①。

自1949年至1978年,在港台和海外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的学术研究,代表有张君励的《评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宋明理学、戴东原哲学三点》^[8],王逸祥的《〈清代学术概论〉读感》^[9]。杨勇的《〈清代学术概论〉考正》则是较早对《清代学术概论》进行校勘的代表,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后来研究者很少注意到^[10]。同期还有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及稍晚一点才出版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对梁启超清季民初政治生涯的研究,为了解其后期学术生涯的背景提供了帮助^[11-12]。同期海外汉学界还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梁启超研究专著,代表是勒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3]、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4]和黄宗智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5]。三者在史学界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这些作品对梁启超学术史方面的论述较少。

在大陆方面,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开始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也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肯定。其中陈祖武的《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贡献》一文^[16],可算是对梁启超的清学研究作出较为全面而成熟评述的代表。陈祖武运用近代学术史标准去重新评价梁启超的清学研究,认为梁启超对近代学术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入了西方进化论,并以梁启超对进化论的运用为中心,考察学术史研究的成绩与局限性。除此以外,陈祖武还对梁启超的史才、史识和史德及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等多方面给予了较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同时期值得重视的还有对梁启超学术史著作基本文献的整理和导读工作,代表有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7]、朱维铮导读的《清代学术概论》^[1]和夏晓虹校注并导读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8]。以上工作都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的引文问题进行了纠正,为梁启超清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朱维铮在相关领域独特的见解和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朱维铮的《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19]一文,以朱维铮在经学史和清学史等方面长期实践为基础,对梁启超和钱穆的清学史著作中的线条简化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并重视从非学术因素的交互作用等角度去理解清学史。朱维铮对

《清代学术概论》的导读则从其成书背景入手,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如重视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对其学术生涯影响,注意到胡适、章太炎和刘师培对其清学史创作的影响等,许多观点都成为后来学界进一步探讨的热点^[1]。同时期关于梁启超的传记和专著数量可观,但对梁启超学术史专门关注的不多,其中,蒋广学的《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就梁启超的清学史创作而言,该书不仅涉及梁启超、胡适和钱穆关于清学论述之间的比较研究,更尝试以三人时代背景及学术关怀的差异来解释其观点的不同^②。

二、改革开放后对《清代学术概论》的不同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后学界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一种趋势,即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学者的清学研究论述之间的比较,较具代表性的有梁启超与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梁启超和钱穆的清学史比较研究起步最早,数量可观^③。汪荣祖的《钱穆论清学史述评》一文,从思想根源和个人背景等方面考察二者差异,并提出应以现代学术史标准去评价二人相同的清学史的观点^[20]。不少研究者也都从不同角度就清学研究提出过与梁钱二人不同的看法,都

①参见朱洪斌《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另外,除上文中朱洪斌提到的沿用两种年谱观点的几种既存研究外,还有几种既存研究也沿用原来的观点,见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又参见刘文楠《并非实录的实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其写作背景再探索》(《文汇报》2010年6月19日第8版)。此后放弃两种年谱说法的研究者也不少,参见吴岩《序言何以成专著——考释五四语境下〈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缘由》(《历史教学》2010年第18期)、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5期)。另外,胡适写给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概论》的两封长函,《梁任公年谱长编》也没有收入,见夏晓虹《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5期)。

②参见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梁本人学术关怀变化和代际差异的研究还可参见夏晓虹《清学的有用与无用——读〈梁启超的学术史二种〉》(《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派分》(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③相关研究可参见路新生《梁任公、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论》(《孔孟学报》第68期,1994年)、陈祖武《谈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品》1999年第6期)、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刘巍《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可视作对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启示^①。

对于梁启超和章太炎、刘师培的清学论述的比较研究,较早关注到这一方面的是周予同和朱维铮。周予同指出:“梁氏讨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21]837}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论清学》^[22]和《梁启超与今文经学》^[23]则是较早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代表。郑师渠将梁启超逐步走出今文学影响的过程与其学术史中对今文学运动的论述互相参照,从而深入考察梁启超与今文学实际上的关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梁启超清学论述中涉及了不少关于今文学运动及其个人经历的部分,似乎尚需对史实进行基本的梳理,因为其已涉及传记和回忆录的性质,与一般学术史尚有区别。如朱维铮就认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模拟康有为惯用的倒填著论时间的手法,给自己预作“盖棺之论”,其“实非客观的历史论著”^{[1]24-32}。有的研究者甚至提出梁启超希望借助《清代学术概论》重构其在晚清以及当时学术界的形象和地位^[24]。不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记忆”似乎还是有区别的。茅海建曾以对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研究为例,指出今日研究者对梁启超“将真迹放大”一语有了不放大的体会,“《戊戌政变记》虽不能成为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但可测量出梁说与史实之间的差距”^{[25]1},“其可成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可靠史料”^{[25]2}。另外,梁启超所处时代的传记观念似乎和今日也有所不同,如郑振铎在其纪念梁启超的文章中就认为“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对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5]。郑振铎在文中更大量直引《清代学术概论》中涉及梁启超本人的部分,有一处甚至点明梁启超的自述“竟使我们无从于此外再赞一辞”^[5]。

李帆的《章太炎、刘师培和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更全面地考察了三人各自关于清学研究的概况和在相关问题上三人的异同。该书不仅从研究视角、重点论题和评价反思等大方面对三人进行比较研究,更以戴震为个案具体分析了三人的异同,可以说是学术史比较研究中较为理想的做法^[26]。此外还有徐亮工整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罗志田为此书所作的导读^[27]。该书将梁启超和钱穆以外,尤其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单篇却不成专著的清学论述汇集起来,意义正如罗志田所说,钱梁异同可视作道咸新学一线产物,应

将乾嘉汉学一线的章刘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并使之与钱梁二著并列而为该领域的基本参考书。罗志田目的并非单纯地提升比较研究中的某一方,而是注意到钱梁二著在该领域话语强势,从而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更深入地去阐释这种强势背后的学界风气和社会背景,并建议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相关研究中对于梁启超清学史是否和多大程度上继承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成果,尚有一些争议^{[28]296}。

梁启超和胡适的有关清学论述的比较研究是一大热点,新成果也较多。较早对二人交谊和思想异同进行研究的有耿云志的《胡适与梁启超》^[29]。朱维铮则较早提示胡适对《清代学术概论》成书的影响^{[1]28-29},值得注意的是,朱维铮并没有单纯强调胡适对《清代学术概论》创作动机的影响和其成书之迅速,更侧重从较长时间段考察其创作动机与成书如此之快的原因。例如朱维铮将论者集中于《清代学术概论》半个月左右成书的视线打开,从创作契机上扩展到至少长达两年的时间段,从受学术源流薰染的角度扩展到梁启超青年时期去考察^{[1]29-30}。与此相呼应的是,桑兵也指出,“梁启超一生,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上都是流质嬗变,而好讲学派却始终一贯,从未动摇”^{[30]15}。既存研究对梁启超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关注一直都是热点,但由于其流质易变,有时要把握所谓相对稳定的时代性,所以有不少困难,落到实处后而多见具体场合和人事牵连对其的影响,而上述二者指出的从较长时段和从多变中寻找不变的思路对相关研究似有不少助益。

徐雁平在《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考论》中已注意到《清代学术概论》与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相互影响^{[31]78}。朱洪斌的《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一文,不仅对梁胡初晤时间提出不同意见,还具体考察了《清代学术概论》成书前后政治因素与梁胡学术交流的重叠^[32]。还有夏晓虹的《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

^①桑兵认为钱梁二人受限于当时清代文献基本情况,要判断二人是非需要后人仔细论证,而桑兵主编的一书中就收入一篇在朱维铮“汉宋之争”相关讨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文章,其提示着对清代史实的基本整理对钱梁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朱维铮的观点参见氏著《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求索真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田的观点见氏著《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适的学术因缘》一文,利用旧有与新发现的梁胡二人的书札,辅以相关文献还原了1920—1922年之间二人的学术交往^[33]。值得注意的是,同期胡适研究的发展为梁胡二人的相关研究也提供有力帮助,一大批和梁启超相关的胡适文字材料被发掘出来,如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4]和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等。不过这批新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尚有不少未被充分利用的部分,例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有一份胡适的清代思想史草稿多达100余页,虽然创作时间不详,内容尚不完整,但涉及了胡适清学史创作的体例线索、主要内容和具体个案,对研究胡适清学研究很有价值。相关研究对上述材料利用程度不高,值得相关研究者进一步关注^①。

此外,中华书局的俞国林校订梁启超文集时,发现了《清代学术概论》的稿本,便以单行本为底本,取稿本、《改造》本加以汇校,由中华书局于2020年10月出版。《清代学术概论》校订本还附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一文,可以视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前身。此外梁启超在1918年所草《清代学术流别纲目》也被收入该书,可视作《清代学术概论》的雏形。该书还收有《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和《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文章,都可视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的补充,最终形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一节^[35]。

三、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

(一) 海外研究

在学术史领域梁启超与日本学者的比较研究日渐受人关注,代表是狭间直树所编的《梁启超·明治维新·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36],桑兵为该书所作的书评《梁启超的东学、西学和新学》也值得学界关注。^[37]此外还有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38]一书和夏晓虹的《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39]一文,它们都就东学背景对梁启超学术史创作的具体影响作了专门讨论。

以上研究虽对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未做专门梳理,但其开创性视野及产生的发凡起例的示范性作用都提示着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路向。尤其是桑兵提出研究者应找到梁启超文本背后东学和

西学的底本,三者互校以求得异同,在力求其所以然的同时,辅以对梁启超私密信件和公开文本按时序进行仔细比照,方能全面而具体地揭示出其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该文所提示的思路已不仅仅只限于梁启超的东学背景问题,对于涉及梁启超的比较研究也都有所裨益。桑兵除对比较研究中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等一般性问题做了探讨外,对梁启超思想研究也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对梁启超的多变特征,一般研究多从其个人性格视角观察,而桑兵则从近代世界接触手段日益丰富与联系更加紧密宽阔的视角去考察。他指出,若仍把梁启超“公开发表的文字直接引用为说明梁启超本人思想的论据”,反而“扩大了对本来就有许多变特征的梁启超思想解释的任意性”,但若仅仅关注作为“媒介”的日本的渊源而忽视近代世界多种可能性,又“容易造成片面甚至曲解”^[37]。桑兵还指出:“如能沿着该书(按: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研究路径并进一步放大,证实中外学术交流融合以产生新学的具体情形,对于认识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作用将更加深入完整。”^[37]桑兵的相关论点对于与梁启超相关的比较研究启发颇多。

关于梁启超将清代考证学比喻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以及称考证学是“科学的研究精神”,有论者指出这都受到日本井上哲次郎及蟹江义丸的启发^[40]。如井上哲次郎在《日本古学派之哲学》的结论中写道:“古学,是作为文学复兴(即文艺复兴)研究的结果而兴起的,结果便是追踪孔子而向上的溯古专研以外而没有其他方式,大概由于文学复兴,一时间我国的学者看破了后世的学问的谬误……我国思想发展的顺序的确是一个进步,像这样,虽然将复古之学统称为古学,但在一定意义上则不如说是新学。”^[41]⁷⁰⁵不过其他中国学者更多是从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思想的特色上去分析的,如吴岩认为其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42]。李锦全认为梁启超早年和康有为正是以今文经学托古改制,所以梁启超强调“以复古为解放”,可能是认为其能将

^① 原稿见胡适著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5—139页)。相关研究见颜军《胡适清代思想史研究浅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另外除上文提到的既存研究外,对胡适和梁启超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见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引向资本主义^[43]。张瑜则认为“以复古为解放”可看作是梁启超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手段,以使中国文化向更高的学术境界发展^[44]。

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出版以来,还有很多外文译本问世,其中以日译本最多。有论者指出该书共有5种日译本:1. 橘仁太郎译《清代学术概论》(《日本读书协会甲种会报》第19号,1922年出版);2. 渡辺秀方译《清代学术概论》(读画书院1922年出版);3. 桥川时雄译《清代学术概论》(东华社1922年出版);4. 山田胜美译注《清代学术概论》(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1973年出版);5. 小野和子译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のルネッサンス》(平凡社1974年初版,1982年、2003年两次再版)^[40]。该论者还指出在二战前的日本,梁启超的政治形象压倒了学术形象,如日本学者德富猪一郎对《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价是:“梁启超这本书,总的来说,是新闻记者的观察。”^{[45][46]}与德富猪一郎不同,日本史家桑原隣藏曾在其《历史上より观たる南北支那》一文中引用过《清代学术概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近几十年,梁启超在日本的学术地位大为提升,如滨口富士雄就指出:“一直以来,对于清代考据学相关的认识,主要是基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作品中被提出的现象,现在研究中较多强调的是清儒的实证主义的、细致的训诂考据成果。”^{[46][47]}

(二)跨学科研究

除了海外研究外,关于《清代学术概论》还有一些跨学科研究。如张冠夫分析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清代文学美术论,他认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援引欧洲文艺复兴的例子,将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但梁启超认为清代文学美术的薄弱则是清学与文艺复兴的最大差异,并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原因,还对建设“新文学”“新美术”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以期建设理性与情感并重的新文化。作者认为梁启超的想法与当时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有明显不同^[47]。萧平和王硕则从佛学理论方面分析梁启超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得失,他们认为晚清的佛学思潮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梁启超就深受佛学的影响,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以“因缘”理论解释清代学术史,以“四相”理论对清代学术史进行分期,虽然

勾勒出了清代学术史的大致脉络,但也暴露出他以佛学理论阐释清代学术史的不足。如作者认为梁启超运用佛学的“因缘”理论来研究清代学术史,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却没将这一理论贯彻到底;还有以“四相”理论来分析清代学术史,将会陷入学术发展循环论的困境等^[48]。此外还有学者从与其他学科比较的角度去探讨《清代学术概论》,如陈伟华的《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一文^[49],作者认为,学术史与文学史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学术史重“以人论流派”,而文学史重“从文本看史脉”。他还认为学术史和文学史尽管都是史,但前者更多是对人的认识,后者则更多是对文本的认识,因此学术史“以论代史”才更能体现出学术研究本身所具有的思辨色彩,相对而言文学史则更需要“论从史出”。

《清代学术概论》之所以在一百年来得到如此丰富的研究,与其作为中国学术史开山典范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如陈祖武认为梁启超的清学史研究具有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晚年治清代学术史的纲领性著作,但又认为如果能将《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为一,那么梁启超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所获当是不可限量的^[16]。《清代学术概论》可以说是未完成的作品,所以就《清代学术概论》或是梁启超清学史研究进行典范考察,在文本界定上需要注意很多问题,在适用范围界定上也有很多不同说法。罗志田对于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界定问题,还有更细微的对“近三百年”“中国”和“清代”等概念界定有专门的论述,但是他在这些微妙的界定之外又捕捉到了共同点,即民初中国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50]。

虽然对《清代学术概论》的研究已有百年,但是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如桑兵、关晓虹主编的《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30]一书就提出应将学术史分为本事和观念两部分加以考察,对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很具启发性的示范。而在其总论中,论者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众多学派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应对包括其在内的众多学派观念从观念史角度逐一进行考察,尤其是对钱梁异同所涉及的“汉宋之争”这一关键性概念,提出了逐一梳理的计划。关于相关领域进一

步发展的方向,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著述外,也有不少超出传统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提示,如罗志田就提出应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按今文学、宋学、诸子学)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50]。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M]. 朱维铮,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 梁启超. 第二自序 [M] // 朱维铮, 导读. 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 夏晓虹.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 [J]. 中华文史论丛, 2010(5).

[4] 胡适. 胡适日记全编 [M]. 曹伯言, 整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5] 郑振铎. 梁任公 [J]. 小说月报, 1929(2).

[6] 素痴.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 [N]. 大公报, 1929-02-11.

[7] 丁文江, 赵丰田. 梁任公年谱长编 [M]. 欧阳哲生,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8] 张君劢. 评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宋明理学、戴东原哲学三点 [J]. 民主评论, 1964(2).

[9] 王逸祥. 《清代学术概论》读感 [J]. 东方杂志, 1974(1).

[10] 杨勇. 《清代学术概论》考正 [J].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1961(3).

[11] 张朋园.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M].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4.

[12] 张朋园.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M]. 台北: 食货出版社, 1981.

[13] Joseph R Levenson. Liang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14] Hao Chang, Liang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 Philip C. Huang, Liang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M].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16] 陈祖武.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M] // 清儒学术拾零.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7] 梁启超.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M]. 朱维铮, 校注.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18]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M]. 夏晓虹,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9] 朱维铮.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求索真文明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0] 汪荣祖. 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M] // 史学九章.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21] 周予同. 中国经学史讲义 [M] // 朱维铮.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22] 郑师渠. 晚清国粹派论清学 [M] // 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3] 郑师渠.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 [M] // 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4] 刘文楠. 并非实录的实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其写作背景再探索 [N]. 文汇报, 2010-06-19 (008).

[25] 茅海建.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6] 李帆.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27] 章太炎, 刘师培, 等.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M]. 徐亮工, 编校, 罗志田,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8] 徐雁平. 《清代学术概论》考论 [M] //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8 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 耿云志. 胡适与梁启超 [M] // 耿云志. 胡适研究论稿.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30] 桑兵, 关晓红. 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31] 徐雁平. 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32] 朱洪斌.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

[33] 夏晓虹. 1920 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 [J]. 中华文史论丛, 2010(5).

[34] 耿云志.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35] 郑凌峰. 异文背后的学术因缘——新校订本《清代学术概论》读后小记 [J]. 国际儒学, 2021(2).

[36] 狹间直树.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7] 桑兵. 梁启超的东学、西学与新学——评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J]. 历史研究, 2002(6).

[38] 郑匡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39] 夏晓虹.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 夏晓虹. 阅读梁

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0]马恒,房鑫亮.经典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7).

[41]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M].东京:富山房,1902.

[42]吴岩.论《清代学术概论》的以复古为解放[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43]李锦全.评“以复古味解放”说——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J].求索,1984(3).

[44]张瑜.“以复古为解放”的现实意义——读《清代学术概论》[J].黑龙江史志,2010(19).

[45]徳富猪一郎.梁啓超君の清代学术概论[M]//氏著《野史亭独语》.东京:民有社,1926.

[46]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拠学の思想史的研究[M].东京:国书刊行会,1994.

[47]张冠夫.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清代文学美术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48]萧平,王硕.梁启超以佛学理论研究清代学术史之得失——以《清代学术概论》为中心[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3).

[49]陈伟华.学术史和文学史比较略论——以《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小说史略》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2005(3).

[50]罗志田.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Acceptance History of *Liang Qichao's Academic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ANG Hao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is a “model” about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Since its completion, there have bee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omments and research. Before 1949, there were not many studies that conformed to the academic norms, but they provided more intellectual history materials. After 1949, specialized academic studies on *Academic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appeared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In Chinese mainland, in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of Liang Qichao mainly focused on th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f his thoughts, rather than his academic history work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cademic circle in Chinese mainland not only makes a positive evaluation on Liang Qichao’s thoughts, but also gives a fair comment on his academic history works, and begins to sort out and introduce the basic literature of his academic history work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academic circle begin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arison of Liang Qichao’s similar works with those of Qian Mu, Zhang Taiyan, Liu Shipei, Hu Shi and the Japanese scholars. With the deep study, in addition to sorting out the basic historical facts to judge and even surpass the opinions of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there also appears the tendency to be more open beyond the scope of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 is worth noticing the oversea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Academic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Academic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academic history;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雪 簪;实习编辑 姜思羽)